



《中国地方珍稀文献 石文契约》,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1200.00元

知识链接

“契约文书”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它的最基础的定义,即是与传统乡村商品交易及经济生活有关的文献,都可称为契约文书。通过契约文书,我们可以直接面对商品交易及经济生活的主体——农民与商人,从而了解传统乡村经济运行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契约文书是了解中国传统农村经济形态的活标本。

□本报记者 李芸

契约“发现之旅”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与石文契约的相遇可以说是偶然的必然。2006年夏天,本在浙江南部搜寻移民以及古建筑的曹树基,偶然在松阳县一个名叫石仓村的阙姓家族老屋里,发现了百余件清代雍正至民国年间的“地契文书”。

这一发现让曹树基既惊喜又惊讶。因为还在大学读书时,曹树基就曾捧读历史学家傅衣凌的著作,如醉如痴。傅衣凌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避难途中,有机会在闽北地区一农家的煤油灯下,读到整整一箱明清时期的土地契约。一代史学大师,在乡间农舍的黑暗中,探索一个已经逝去长远的时代,由此开创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新领域。“傅衣凌的传奇性故事,曾令年青时的我感慨万千。当然,那时我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居然还有参与发掘此类文献之机缘。”正是凭着常年在地方法史地

理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对微观历史的研究关注,曹树基意识到这些文书在还原村落历史生态、重新构造国家历史记忆上的重大意义。于是,他找来当地一个名叫阙龙兴的小学校长,负责全力搜寻石仓村目前所有留存的地契约文书。最终,在这个村庄中,找到了8000余件契约文书。

石仓的契约文书是徽州文书后,首次发现的村落文书。徽州文书于20世纪50年代在徽州屯溪被发现,有“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的称号。但由于历史原因,徽州文书分散于全国十多家研究机构。而石仓的契约文书却是在一个小小村落及其周边,有多达8000件的契约,数百种其他文书。地点集中且各种资料相互匹配,这为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

曹树基认为,就目前的情况看,石仓的土地契约可能是一个集中的村落群中保存契约文书最为齐备、数量最多、种类最多且记载最为清晰的村庄。所谓“齐备”,指的是契约的系统性,

往往一块土地的数次买卖契约保存完整;所谓“数量多”和“种类最多”,是因为至今为止,无论是在发现大批林业契约的贵州锦屏,还是在徽州,甚至在被称为“中国研究实验室”的中国台湾地区,都没有类似的记录;所谓“记载清晰”,指的是全部契约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找到所标识的田地或山场。

“疯狂”的编辑原则

契约搜罗完毕后,曹树基等学者考虑的是要将这一庞大的资源进行整理并予以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欣然接受这一选题,并计划在2011年推出丛书“石仓契约”三辑,每辑8册,共24册。曹树基等以自然村为基本单位,以姓氏或家族为次级单位,以时间为纲,分类编辑这些土地契约。“石仓契约”责任编辑、浙江大学出版社陈丽霞说:“这次‘石仓契约’的出版我们希望要完整地保留文书的原貌,让契约说话,采用简单、直接、不虚华的包装方

式。我们将契约图版与录文同时刊出。虽然这样工作量大,且成本高;但是我们考虑到一方面没有录文的图版影印,很难说是古籍整理,另一方面,没有图版参照的土地契约及其他民间文献,读者又很难放心使用,文字的错误与错录,最后可能导致意义的错讹乃至颠倒,而这类错误几乎是不可原谅的。”

“石仓契约”丛书将各个时期的土地契约扫描件进行双色印刷,抄录文字在标点前依原格式编排,以便于对照。曹树基等学者不仅采用了图版与录文对照,而且对原文中的异体字进行了统一处理,并依原本本来样式,原文繁体即繁体,原文简体即简体。并对契约中难以理解的字词进行注释,将契约中的人名、地名其他内容,制成索引,便于读者利用。曹树基说:“这在中国大陆的出版界是比较罕见的,在中国台湾出版界已经成为了主流,但中国台湾的此类出版物较少,一个县往往只出版一至两本,不像石仓,一个村庄一次可以推出三辑24册。他

的工作量无法与我们比较。我记得几年前,我将这一编辑原则告知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时,他说我疯了。”

说起这几年艰难的时光,曹树基颇为感叹,但欣慰的是,终于“石仓契约”按原计划推出了第一辑。

普通民众的点滴记录

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确,我们很多的历史只是记载了帝王将相朝朝换代的过去,在这些正史的宏大叙事中,只有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没有普通民众的点滴记录。这种缺少普通民众在场的历史,是苍白的、单调的。要了解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就要搜集民间文书,从买卖契约、账本、家谱、书信、收据、分家文书等资料中,去窥见民间的历史记忆,复原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民间社会生活。

从松阳县的石仓,这样一个小流域面积不足几平方公里的

小村庄里,收集了大约8000件土地契约及数百种民间文书,可以说勾勒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形态提供了最好的文献。这与村民生活有关的各类文书,包括分家书、收租簿、置产册、流水账、各类蒙书、商业文书、医生诊疗笔记、科仪书等,能帮助人们进入石仓村村民生活的世界。

曹树基认为石仓契约的发现之旅以及大规模的出版,对于提高民众关注文化遗产留存素质的、唤醒现代公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很有意义。

在出版方浙江大学出版社看来,“石仓契约”为大众和学界呈现了相当珍贵的近代小流域体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一手资料,这是明清时期中国东南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一个典型案例。而曹树基对文书的首创性释读,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窥测山区社会变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农村社会形态的活标本。契约的发现、整理和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填补了浙江省民间文献搜集与整理的空白。”

“知识转型”时代的学术使命

经过知识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有可能从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的“消费者”转变为世界社会科学理论的“生产者”。

□孙国东

关心中国教育和中国学术的人可能都注意到了晚近以来的“高研院现象”:大约自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复旦高研院”)成立的2008年开始,各种形态的“高等研究院”或“高级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著名高校建立起来——在《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修订版序言中,复旦高研院院长邓正来将这一现象解读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化的一种新的努力方向”,即“对知识生产机制的批判到对新型知识生产机制的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复旦高研院的学术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我们认识中国“高研院现象”的一个突破口。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解读复旦高研院呢?在我看来,由商务印书馆最近推出、邓正来主编的两本“讲演录”——即《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范本。

我的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在于:这两本“讲演录”不仅是复旦高研院两个着力建设的品牌性讲坛——“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的讲演录,而且承载着邓正来意图引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知识转型”的学术担当。

在邓正来的理解中,所谓的“知识转型”其实是一场试图对抗中国社会科学唯西方化、唯学术化、知识地方主义等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欠缺世界视野和中国关怀、缺乏文化政治担当、无力走向世界等弊端的学术革命。从历史性的角度看,知识转型指向了自觉提升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自我革命意识,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要从此前的引进(即晚清以降以降延至今的“知识引进运动”)、复制(即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复制西方理论创新模式的尝试)与国际接轨(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在学术规范、学术建制等方面与国际全面接轨)的历史阶段,迈向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新的历史阶段,即走向世界的阶段。

从共时性的视角看,知识转型则标志着自觉捍卫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身份意识,它意味着: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社会科学知识的“话语”实质,努力在全球化时代建构符合中国文化政治担当,即符合中国人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身份的社会科学理论,进而积极参与到全球化时代的“话语争夺”中去。由此可见,经过知识转型,中国

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有可能从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的“消费者”转变为世界社会科学理论的“生产者”。借用费宜理的话来讲:“中国研究就有可能从一个‘消费领域’(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获得分析的洞见)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即有能力产生出令一般比较研究者感兴趣的原创性分析)。”

有了这样的理论背景,我们就可以把“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以及这两本讲演录视为复旦高研院自觉践履“知识转型”时代学术使命的具体体现及成果。正如邓正来在序言中指出的:“‘知识转型’不仅是我们创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一个主要背景,更是我们设计和开展高研院各种学术活动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

“知识转型”时代的“知识引进运动”

不言而喻,《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主要承载的是知识引进的学术使命。邓正来在“知识转型”时代仍然主张继续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相对西方而言,中国社会科学不仅仍处于整体落后的局面,而且就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世界体系、世界结构和主体性中国等问题的认识而言,西方社会科学仍是我们的主要理论参照。第二,只要我们不把西方社会科学当做我们研究的判断,而只是将其作为认识中国问题的参照——换言之,只要我们以“中国”为思想根据,否弃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非语境化移植等倾向,我们就可以在坚持中国社会科学开放性的同时保持其自主性。由是观之,“知识转型”时代的到来绝不意味着“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它毋宁意味着那种视西方社会科学为中国社会科学之判准的知识引进阶段的终结。

进一步言之,在“知识转型”时代,我们既要否弃为邓正来一直批判的那种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现实的“前反思性接受”,“学术消费主义”倾向,也需戒绝为黄宗智等论者所着力批判的“中西对立”的“二元化思维”。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和“中国”早已不是两个毫无交集的政治实体,“西方”早已内在于“中国”之中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建构所依凭的思想资源只能是切己的,而不是排他的。只要具有解释力,包括西方社会科学在内的任何理论都应当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问题的思想资源。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

演录》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上述学术使命的范本——尽管它尚不完善。该书收录了西方知名社会科学学者的前沿性理论和思想。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对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与人性之关系的论述,著名历史学家王国斌对中国社会关系和政治转型的历史与比较研究,“法律与发展”学派奠基人戴维·M.特鲁贝克关于法律与发展理论的最新论述,著名人类学家王斯福关于中国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解读,“WTO之父”、著名国际法学家约翰·H.杰克逊关于WTO与中国关系的分析等都堪称具有代表性的

然而,任何理论创新都是既有学术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要想对中国进行深度理论探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既有的中国研究相关成果。《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展示既有中国研究成果的平台。在该书中,王铭铭的“三圈说”、许纪霖对中国政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邓正来主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5月出版,定价:25.00元

在古典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部分西方传统共存当下中国,究竟是何种因素促进了近30多年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可能对世界学术作出贡献的重要领域。

然而,任何理论创新都是既有学术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要想对中国进行深度理论探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既有的中国研究相关成果。《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展示既有中国研究成果的平台。在该书中,王铭铭的“三圈说”、许纪霖对中国政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邓正来主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10月出版,定价:24.00元

治正当性论说的思想史梳理、沈志华对中国冷战国际研究的考察、林尚立关于中国民主化问题的建构、曹锦清关于中国研究方法的论述、石之瑜对“天下”与“亚洲”对当代中国研究之挑战的揭示、马戎对当前中国民族问题之症结和出路的分析等等都为我们认识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或参照。

何谓“深度研究”,何种“重新发现”?

在邓正来那里,知识引进运动的“引进来”与基于中国深度研究的“走出去”是统一的,其统一性在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实是服务于中国深度研究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中国深度研究”、“重新发现中国”视为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走向世界)的关键环节。然而,我们究竟该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何种中国研究堪称“深度”的中国研究?

邓正来强调指出: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重新”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

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以进一步发掘中国人所具有的“生存性智慧”和思想资源;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毋宁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文明体;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中国”亦不是排他性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当下中国,而毋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

按照我的理解,知识转型时代的重新发现中国(或中国深度研究)其实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如下规范性要求: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要具有文化政治担当,即自觉将文化认同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哲学承诺。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对当下中国问题的深度社会—历史分析。因此,只有具有文化政治担当(或政治哲学承诺)且回应了当下中国问题的社会—历史规定性的研究成果,才可以称得上是建立在中国深度研究基础上的社会科学成果,也只有这种成果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然而,究竟何种“重新发现”堪称“深度研究”却是需要我们的学术研究实践予以点滴回答的。单就文化认同而言,至少有如下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如何在诉求文化认同的同时避免民族主义(特别是复古主义的民族主义)?如何在诉求文化认同的同时回应转型中国日益凸显的各种正当化压力(如贫富分化、“社会溃败”等)?在古典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部分西方传统共存并拉锯互动的当下中国,我们究竟该如何处理上述三种传统之间的关系?在具有双层民族结构(即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和官方认定的56个民族)的中国,如何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即如何处理文化的多样性、文化认同的多层次性与国家统一、政治整合之间的关系)?我们究竟需要何种文化认同理论以同时回应上述难题?等等。

显然,如果严格按照前述规范性标准,《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收录的很多文章其实称不上“中国深度研究”。因为它们或者缺乏文化政治担当,只是有意无意地将中国视为某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范例”;或者径直将这种文化政治担当转化为捍卫“中国文化主体性”(牟宗三语)或既存社会—政治秩序的学术尝试;或者忽视了对当下中国问题之社会—历史规定性的深入考量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这些文章都构成了我们重新发现中国、进一步推进中国深度研究的必要起点。

□纪家梅

陈香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活动家,人们总是对她充满智慧的人生经历以及在美国政坛的光辉感叹不已,殊不知她也是一位与张爱玲等同时代的优秀女作家。她是一位自传体作家,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背景,创作出了与其他女作家不同视角的优秀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

庄文永的这部以研究陈香梅人生与写作的论作,通过对陈香梅的生命历程的分析,揭示了她对女性的存在意义与存在价值的独特理解以及文化思想倾向。陈香梅总是将视点聚集在女性心理上,发挥女性特色,关注女性价值,情系民族情怀,并注入人文主

读陈香梅,透视现代女性

义关怀,但是陈香梅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甚至对男性是崇拜的,她只是个善于描写传统女性美德的作者,她的独特视角引起笔者对现代女性存在价值与意义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非凡女性》从六个章节来剖析陈香梅的生命与写作:文学创作与文化底蕴、中短篇小说的文化内涵、长篇小说《谜》的文化主题、《一千个春天》的人文光辉、散文创作的中西文化视野、叙事特色与文化语境。作者通过对陈香梅生活的环境,包括时代背景、历史背景和家庭背景的研究,系统地分析她文学创作的风格,挖掘出陈香梅的文学底蕴的形成,童年及战争的颠沛流离生活对她性格及思想的影响;然后通过陈香梅作品的人物构造,再反过来探讨陈香梅文学作品中虚构人物所表达的真正思想,即她们是真实的,传统的,具有母性般的宽容与爱的,却又在爱的道路上经历着荆棘与挫折,或是悲剧或是隐忍。陈香梅虽然注重女性个人感受,但不同于女权主义者,她认为女人的一生离不开爱,爱是女人用其一生经营的事业。

陈香梅笔下的女主角大多是像她一样善良柔美的,具有传统智慧与传统美德。在传统意义上,她们繁衍后代,相夫教子,遵守三从四德。而陈香梅出生在上世纪动荡年代的大户人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已经与传统中国女子相去甚远,但是她依旧保有中国女子的柔美与贤惠,这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也是女人的天性息息相关,更离不开自身良好的教育和优雅母亲对她的耳濡目染。

陈香梅的父亲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受到父亲的冷落;母亲社交频繁,也没有什么时间陪她,从小就缺少爱与母爱的她更是敏感细腻,却增加了她文学作品的热爱,这也加深了她的文化底蕴,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陈香梅曾是中央通讯社第一位女记者,后嫁给美国“飞虎队长”

陈纳德,二战后一直在美国政坛活跃。如此坚强有个性的女性却不失温柔与贤惠,这与她所接受的中西方文化不无关系。中国文化中,女子无才便是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好女子好媳妇,男尊女卑,女性地位低下,慢慢失去主见,变得柔弱;但是西方文化中男女相对平等,女性独立有主见。中西文化的碰撞,使她的感性中又有不失理性的一面,特别是在陈纳德将军去世以后,她的努力,她的打拼都超越了所有中国传统的温婉女子。

纵观社会历史,文明造就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现代社会女性地位的慢慢提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的:“既然人天生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挥自己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



《非凡女性》,庄文永著,2010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定价:30.00元。

的力量判断……应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女性同样是社会的人,她们的人生价值同样要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实现,更多人把焦点放在了男权平等上。时代的进步,思想的解放,西方文化的渗入,使得现在的社会变得多元化,女性不再是单一的性格,她们活泼可爱、温柔大方、野蛮霸道、雷厉风行,也不再单一地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她们活跃在一线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甚至有才能的女性更加受到重视。古人所讲的“修身齐家”,有好的教养才能治理好家政,女性与男性同样有义务“修身”与“齐家”,但是女性与男性的区别就在于女性是温柔的具有母爱与包容的,女性在社会存在的价值更多的是产出爱与宽容,而不是一味强调女权主义。这也正是陈香梅创作中与其他同时代作家不同的地方。

此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优秀杰出的中国女性,以及她对女性价值的观点,古圣先贤说阴阳有别,相辅相成;柔能克刚,刚柔相济。只要摆正这正确的两性关系,才能营造和谐的婚姻氛围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女性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也在于此。